


 韩国研究文库

한국 독립운동 연구의 새로운 탐색

# 韩国独立运动 研究新探

——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

石源华 主 编  
郑继永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 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 90 周年 / 石源华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韩国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1143 - 9

I. ①韩… II. ①石… III. ①独立运动 - 研究 - 韩国  
IV. ①K3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0554 号

· 韩国研究文库 ·

## 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

——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 90 周年

---

主 编 / 石源华  
副 主 编 / 郑继永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mailto:bianyibu@ssap.cn)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昔秀颖 宋浩敏  
责任校对 / 张秀娟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3.25  
字 数 / 559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143 - 9  
定 价 / 8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Korea Foundation**

---

한국국제교류재단

The Korea Foundation has provided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undertaking of this publication project.

此书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资助出版，特此致谢。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 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胡春惠\*

## 前 言

早在日韩合并之前，韩国社会即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如闵泳焕之殉国、海牙密使之派遣、各地义兵之蜂起，以及1909年10月安重根之刺杀伊藤博文等。但是一个真正代表韩国全民族独立运动之兴起，则应是1919年3月1日，在汉城塔城公园引爆的“三一”示威运动。“三一”运动不但激化了韩半岛各地群众对日本殖民化的反抗暴行，更有意义的，乃是韩民族的反日情绪开始转化为光复故国的有组织行动。最能代表此一转化的，便是他们组建起了一个全民族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便是日后在中国存在了27年之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sup>①</sup>

1919年“三一”运动在韩国各地爆发以后，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便知道仅是散发传单、喊口号、发表独立宣言来追求韩国独立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一个类似政府的形象化组织，来领导各个独立运动团体，方克有济。<sup>②</sup>

首先是俄国远东地区的韩人，在1919年2月21日召开了“大韩国民议会”，仓促地想成立一个韩人独立政府，并提名孙秉熙、朴泳孝为正副大总统，国务总理李承晚、财务总长尹显振、军务总长李东辉、内务总长安昌

---

\* 本文作者系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院长，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① 参阅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第16页。

②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3），1967，第4页。

## 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

浩、产业总长南亨佑、参谋总长柳东说及出席巴黎和会大使金奎植。此时在汉城也有一个来自 13 道的全韩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代议政制精神为基础的临时约法，也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临时政府。此临时政府之组织与人选则为：执政官总裁李承晚、国务总理李东辉、外务部总长朴容万、内务部总长李东宁、军务部总长卢伯麟、财务部总长李始荣及次长韩南洙、法务部总长申圭植、学务部总长金奎植、交通部总长文昌范、劳动局总办安昌浩、参谋部总长柳东说、次长李世永。此外并选出 20 名评定官和 7 名前往巴黎和会之代表委员。<sup>①</sup>

其次，在上海方面，当“三一”示威运动的消息传抵中国之后，原先在上海之独立人士如吕运亨、张德秀等也在上海法租界设立了一个事务所，负责向中国各界及外国报纸散发有关韩人独立革命之宣传文件。<sup>②</sup>此后，各地独立领袖纷纷从美国、日本、朝鲜国内及俄领西伯利亚等处汇集上海，多数人士主张在上海成立一个统一的韩国临时政府，推动韩国国内及海外所有的复国事宜。最后更因姜大铉将汉城临时政府之阁员名单及约法原文带到上海之故，大韩民国第一届临时议政院会议，很顺利也很合乎理念地于 1919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开始集会。正式议定国号为“大韩民国”，定 1919 年为大韩民国元年。选出之国务领导层则为：

临时议政院议长：李东宁

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承晚

内务总长：安昌浩

外务总长：金奎植

法务总长：李始荣

财务总长：崔在亨

军务总长：李东辉

交通总长：文昌范

他们并以大韩民国元年（1919 年）4 月 10 日的韩国新年号，发布了“政纲”

<sup>①</sup>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3），第 4 页。

<sup>②</sup> Chong-Sik Lee, *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130.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和“宣誓文”。声言为了反抗日本非人道统治和屈辱，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呼吁二千万韩人（当时韩半岛人数）同胞，为了子孙万代荣辱，不惜流尽最后之一滴血，来完成光复故土，重建原有的“神”的国家之使命。<sup>①</sup>

### 一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完备化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时，本宣布了一个包含了10条条文的“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及6条政纲，但对于政府组织架构及领导之权责分工，并无较正式之规定。<sup>②</sup>加以临时政府之领导层，在形式上虽已产生，但包括国务总理李承晚本人等尚未来到上海，各部总长也均有名无实。不过基于民族复国的激情，各地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已纷纷向中国的上海聚集。1919年7月11日，包括美洲、中国东北各地及俄领代表在内的大韩民国第五届议政院会议在上海召开。<sup>③</sup>议政院人数既已增加，而韩国本土、美领、俄领及中国各地韩国独立运动者的意见也必须整合，于是一个新的、完整的《大韩民国临时宪法》在1919年9月11日被正式制定出台。此时临时政府基本上采用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府组织中之临时大统领、临时议政院、国务院、法院均有专章，权责之规定也开始明确化。<sup>④</sup>

《大韩民国临时宪法》既已公布，政府自然要依照新的宪法改组。经由议政院正式选举李承晚为大韩民国之临时大总统，并经由李氏依新宪法第15条之规定，提名李东辉为国务总理、李东宁为内务总长、朴容万为外务总长、卢伯麟为军务总长、李始荣为财务总长、申圭植为法务总长、金奎植为学务总长、文昌范为交通总长、安昌浩为劳动局总办。<sup>⑤</sup>

随着李承晚、李东辉等人从美国、俄领、韩国本土及中国东北等地的到来，韩国临时政府人事日趋完备。人才汇集既达于顶峰，因而进一步建立了“大本营”、“参谋部”、“军事参议会”及“会计检查院”等单位，其“大

① 《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宣布文》、《宣誓文》，均见《零南李承晚文书》。

② 《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宣布文》、《宣誓文》，均见《零南李承晚文书》。

③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3），第6页。

④ 《零南李承晚文书》（东文篇），第46~56页。

⑤ 上海1919年9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号外。

本营”制除有参考孙中山此时在广州树立的“大本营”建制以外，自然也有一种提升革命精神与对日武装斗争的含义在内。此时在临时政府建制中，除大统领李承晚、国务总理李东辉及另外 8 位国务委员外，还有国务院秘书长崔昌植（前）和金文（后）、法务部次长申翼熙、内务部次长玄楯、外务部次长张建相、学务部次长李圭洪（前）和李春塾（后）、交通部次长金澈、财务部次长尹显振，加上其他局长、参事、秘书、书记等人，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内，实际任职人员达 40 人左右。

## 二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改组及人事变化

1919 年“三一”运动前后，可以说是大韩民族要求独立复国的沸腾点。这与日本统治韩国的暴行有关，当然也与 1918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发表的“民族自决”宣言有关。因而在 1919 年春天巴黎和会召开的前后，成为东方弱小（包括中国）民族主义最蓬勃的时期。然而此一时期，也是西方世界各类思想学说、主义涌入东方社会的萌芽季节。特别是此时中国的上海，由于各国租界的存在，便成为各种西方新思想、主义在东方扩散之温床，其中尤以无政府主义及各类社会主义为然。<sup>①</sup>因而也影响到了在上海立足的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终因意识形态的逐渐差异，使其由万众一心走向彼此背离。

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走共产主义路线的李东辉等人，因列宁援助的 200 万卢布问题被发现用途不明，大受议政院议员之指责，不得不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离开上海。因而临时政府在此情况下，临时进行了一次改组，由内务总长李东宁代理国务总理。<sup>②</sup>从此左翼、右翼派系斗争加剧，临时政府在人事上，开始进入极度不安定的状态。

依照 1921 年 5 月 31 日韩国临时政府公布第 21 号公报所载，李承晚大统领在 5 月 26 日发表内阁人事命令，由法务总长申圭植代理国务总理、内

---

① 1960 年 8 月 13 日上午，美国康州大学副教授马时梓（Herman Mast）在台北青潭“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有关“五四运动以后之戴季陶与中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专辑报告中曾如此指出。

② 1921 年 2 月 7 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号外，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资料集》（1），第 105 页。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务总长为李东宁、代理外务总长为李会荣、军务总长为卢伯麟、代理学务总长为金仁全、财务总长为李始荣、交通总长为孙贞道。<sup>①</sup> 但不到三个月李承晚再以命令发布，由代理国务总理兼法务总长的申圭植再行兼摄外务总长。原因可能是要配合申圭植氏正前往广州面见孙中山，游说中国广州的护法政府，给予韩国临时政府以外交承认有关。<sup>②</sup>

此时，正逢太平洋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这是韩人向世界列强诉说韩国要求独立的大好机会。因而在1921年9月29日临时议政院第九届会议中，通过了由李承晚大统领本人及韩国临时政府驻欧美委员部部长徐载弼为代表，直接到美国华盛顿向出席太平洋会议的各国代表提出申诉。而此时代理总理申圭植因已离开上海在广州停留，所以临时议会眼见大统领远离，而代理总理也不在上海，基于紧急情况与灵活原则，决定打破行政立法分离之原则，实行议政院与政府之协同精神，对重要国务事情，采取两者合议方式进行，同时也决定改选由军务总长卢伯麟为代理国务总理。<sup>③</sup>

卢伯麟出任代理总理不到一年，即因临时政府内部派系纷争越来越激烈，于1922年9月1日去职，国务总理由内务总长金九临时代理。23天后，金九的临时国务总理被解除，临时议政院选出李东宁为正式之国务总理。同时并依大韩民国临时宪法第17条规定，在李承晚大统领因事赴美期间，由国务总理代行大统领之职务。不过李承晚名义上仍为大统领，其所遗上海之职务由国务总理李东宁代为行使。此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领导层人事为：国务总理兼军务总长李东宁、内务总长兼劳动局总办金九、外务总长赵素昂、法务部代理总长金甲、学务部代理总长金承学、财务总长李始荣、交通部代理总长金圭冕。<sup>④</sup>

实际上，此一时期，不但临时政府的人事更迭频繁，即使临时议政院，从议长、副议长到议员人选，也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包括议长有尹琦燮、赵尚燮、吕运亨之选任及去职，副议长赵尚燮、吕运亨、崔昌植的一再更替等。加之李承晚以大统领身份出席太平洋会议之名离开上海已三年之久，李氏的

①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资料集》（1），第10页。

② 按《国父年谱》（1994年，台北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记载，申圭植于1921年10月在广州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的身份晋见孙中山大总统。

③ 1921年10月2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院发行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36号。

④ 1924年9月1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院庶务局出版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迟迟不返上海，渐引起临时议政院及临时政府内部的不满情绪，李氏的大统领适任与否成为上海韩人议论的焦点。在此情况下，临时议政院在议长崔昌植的主导下，经议员赵尚燮等提案，通过了李承晚有违法之嫌。在经由弹劾审议之后免职，并正式补选在上海之韩国学者朴殷植为临时大统领。<sup>①</sup>

朴殷植当选为大统领，除了说明临时政府内部派系倾轧之外，也代表了临时政府在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原因是当年直接参与“三一”运动的前辈如申圭植等的亡故或引退，而年轻一辈适时的加入和继起，因而国务院人事上也就有了新一轮的调整。1924年12月11日起，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人事改变为：大统领兼国务总理朴殷植、代理秘书长白基俊、代理军务总长郑润、内务总长李裕弼、法务总长吴永善、学务总长赵尚燮、财务总长由外务总长李圭洪兼摄。<sup>②</sup>

### 三 政府组织形态之改造

朴殷植出任大统领时代，韩国临时政府有几件大事件发生。一件为对李承晚之弹劾与审判，认为李承晚以大统领身份久假不归，且基于私利擅自以大统领名义，未经上海国务委员同意，便截留在美领夏威夷民团长及妇人会会长收取的韩侨对临时政府之人口税经费。此举不但分化割断了上海临时政府与美洲侨民之关系，也破坏了临时政府统一指挥独立运动之领导权。<sup>③</sup>另一件重大事件，即为对《大韩民国临时宪法》之修订。1919年9月所颁布之《大韩民国临时宪法》，虽然一部分是仿照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涵，在大总统之下有国务院且设有国务总理职位，但基本上是采取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制之精神。在行政权上，大总统是有决定权的独任制，而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仅是临时大统领的补佐或命令的执行者。但是现在既然发生李承晚渎职且与在沪的临时政府分庭抗礼情况之出现，临时议政院虽已改选朴殷植为临时大统领，但为了防范故事重演，乃决定要修改临时宪法，将大统领独任制架构，改为近乎内阁制之国务领制，即国务领由议政院选出，并须

① 朴氏曾有一本《韩国独立之血史》专著，驰名中外。

② 1924年12月27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原件现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③ 1925年4月30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42号。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对议政院负责，同时也加重了国务会议各国务委员合议制的色彩，以限制国务领之独裁专擅。1925年3月30日，临时议政院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大统领一章除去，并在“临时政府”专章中，正式将行政与司法大权交与国务领与国务委员所组成之国务会议统办执行，而且规定由国务领代表国务会议向临时议政院负其责任。

《大韩民国临时宪法》之修正案虽已通过，但依法制常规应有一缓冲期，所以议政院与临时政府又决定，新宪法应在大韩民国七年（1925年）的7月7日以后才正式施行，在此之前，仍由朴殷植依循旧宪法行其大统领职权，所以在同年5月18日的公报上，仍看到临时政府之领导层人事为：

临时大统领：朴殷植

国务总理兼军务总长：卢伯麟

内务总长兼摄劳动局总办：李裕弼

法务总长：吴永善

学务总长、交通总长：赵尚燮

财务总长兼摄外务总长：李圭洪<sup>①</sup>

为了实行新改定后的临时宪法，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特别在1925年7月7日在上海举行了“临时宪法施行式”，同时实行原任大统领朴殷植告别式，并将大韩民国之国印交还议政院长崔昌植。接着，由临时议政院依照改定之临时宪法第十三条之规定，选出李相龙为临时政府新形态的第一任国务领。依照此时之临时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委员总额为5~10人，系由国务领李相龙推荐经议政院选任。根据记录，1925年10月10~12日选出之国务委员为李洵、金东三、吴东振、尹世茸、李裕弼、玄天默、尹秉庸、金佐镇、曹成焕。

但是李相龙对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生态并不适应，所以在出任国务领并组成内阁不久，便因得不到大家主动的支持而离开上海折回延边，李内阁因而正式倒台。<sup>②</sup> 临时议政院在1926年2月18日再行选出梁起铎为第二任国务

<sup>①</sup> 1925年5月18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号外，原件藏于韩国岛山纪念馆。

<sup>②</sup> 金九：《白凡逸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第168页。

领，在其未到任之前，由议政院院长崔昌植以“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务领之职权。但是因为梁起铎拖到4月29日还不能就任，所以被视为当选无效加以解任。临时议政院再在5月3日重选安昌浩为国务领，但安昌浩同样到5月24日也未到任，也被宣布当选无效，而后到7月7日临时议政院再选洪震（冕熹）为国务领。洪震就职以后，临时政府规模稍具；除国务领之外，分别有金应燮、李裕弼、赵尚燮、赵镛殷（即赵素昂）、崔昌植为国务委员，由崔昌植任内务长、李裕弼为财务长、赵尚燮为法务长、洪震兼外务长，而从前的军务、学务、交通与劳动总办等部均不见了，足见韩国临时政府的组织规模已萎缩了甚多，而原来的各部总长也均改名为内务长、外务长。<sup>①</sup> 这是韩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最剧烈的一段时光。

#### 四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李东宁时代

洪震任国务领之后约半年，即因种种困难而要求辞职。是时，因为中国东北的奉系张作霖刚与日本朝鲜总督府之警务局长三矢宫松签订了所谓的《三矢协定》，加强了对延吉一带韩国独立运动者之禁止与追捕，<sup>②</sup> 韩国独立运动之支持度受到极大打击。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也面临人财两空，几近于崩解状态。在此窘况下，议政院院长李东宁劝请内务总长金九出任国务领，在经过一再劝说之下，议政院乃正式通过金九接任洪震的国务领职务。<sup>③</sup> 金九是在1926年12月10日被议政院选任的，议政院也同时选任了尹琦燮、李圭洪、金甲、金澈、吴永善为国务委员，并分别出掌内务长、外务长、财务长、法务长及军务长。<sup>④</sup> 政府虽组织起来了，但是财政却一文不名，为了解决此窘况，大家以“爱国金”名义自动乐捐，最后募得了大洋149元，用来解决临时政府交缴房租等燃眉之急。<sup>⑤</sup>

① 1926年12月16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44号，见《零南李承晚文书》（东文篇，第8卷），第248~250页。

② 根据李万烈《韩国史年表》（汉城，1985）第24页记载，该协定签订日期为1925年6月11日。

③ 金九：《白凡逸志》，第168页。

④ 1926年12月17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见《零南李承晚文书》（东文篇，第8卷），第251页。

⑤ 1926年12月30日《财务长金甲财务公告》，藏岛山纪念馆。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金九出任国务领之后，一方面认为自己出身寒微，人望不足；另一方面也希望促使国务委员之间能同心协力，共同承担复国大任，因此他建议再行降低国务领之独任制色调，而实行国务委员之集体领导制。在经由议政院议员尹琦燮等 14 人的提案下，1927 年 4 月 11 日又行修正《大韩民国临时约宪》，将国务领改为国务会议主席。这一方面提高了临时议政院的地位，使之成为“大韩民国之最高权力机构”，同时也将国务院改为国务委员合议制，对于国务事项均由国务会议集体向议政院负责，而国务委员会主席也改由国务委员互选，大大降低了主席领导地位的色彩，加深了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的精神。<sup>①</sup> 这一改变，正好与此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采的委员制设置主席一职相一致。

在修正后的临时约宪中，金九所担任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只是接近虚位元首式的会议“主席”，任何国务委员的权利或责任都是平等的，并且主席也开始由国务委员互选轮流担任。<sup>②</sup> 但在精神上还是靠辈分较长的李东宁的凝聚力作用，所以在 1935 年 11 月以后，国务会议主席较长时期便改由李东宁担任，而此时金九除辅助李氏之外，将其全部精力放在韩国独立运动的实际工作上。其中如李奉昌在东京樱田门狙击日皇“不幸不中”事件，及接着而来的尹奉吉在虹口公园炸死白川大将事件，均使金九声名鹊起。根据 1932 年 5 月 22 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号外所载，此时临时政府由原国务主席李东宁及另外 4 位国务委员赵琬九、赵素昂、金澈和金九诸人组成。<sup>③</sup> 但是 1933 年 6 月 30 日临时政府所发行的公报第 55 号上，却记载着议政院已改选曹煜、宋秉祚、金奎植、李承晚、尹琦燮、申翼熙、崔东昨、车利锡、李裕弼 9 人为国务委员，原因应是金九和李东宁二人因日本及上海法租界的追捕而行踪不明，旷职两个月以上，而赵素昂、赵琬九、金澈 3 人也因而辞职离开之故。<sup>④</sup> 此一改组主要内幕，当然是由于尹奉吉虹口事件之后，金九、李东宁已成日本悬赏缉捕的对象，而法租界当局对韩国临时政府诸人赵素昂、赵琬九、金澈，也不敢再加庇护，所以只得分别隐藏到嘉兴、海盐、南京去。<sup>⑤</sup>

① 参见 1927 年 4 月 11 日《大韩民国临时约宪》，原件系由金明浚先生后孙收藏。

② 金九：《白凡逸志》，第 168～169 页。

③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集》（1），第 174 页。

④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集》（1），第 175 页。

⑤ 金九：《白凡逸志》，第 183～189 页。

1934年12月30日，由于国务委员曹煜、宋秉祚、金奎植、李承晚在美，尹琦燮等9人期满解任，临时议政府又改选宋秉祚、尹琦燮、赵素昂、梁起铨、金奎植、崔东旼、金澈、成周实、曹煜9人为国务委员。1935年9月，因尹琦燮、成周实二人辞职，议政府再行补选柳东说和车利锡为国务委员。此人事名单一直维持到1935年9月1日，由于金元凤（若山）的鼓动，酝酿解散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柳东说、梁起铨、金奎植、崔东旼、赵素昂集体辞职，使临时政府再度为之中断。<sup>①</sup> 临时政府中断两个月后，临时议政府在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非常会议，补选了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曹成焕等5人为临时政务委员，加上原先的宋秉祚和车利锡，使韩国临时政府得以在李东宁、金九领导下东山再起。重建后的临时政府，李东宁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内务长为赵琬九、外务长为金九、军务长为曹成焕、法务长为李始荣、财务长为宋秉祚、秘书长则仍由车利锡担任。<sup>②</sup>

盖1933~1937年间，在华的独立运动者又因新一轮的左、右路线之争及“五党统一”问题再起纠纷。其中左派是受到中国军方黄埔系支持的“朝鲜义烈团”金元凤及金科奉等少壮派，而代表右派的则是受到中国“CC”派支持的“韩国国民党”金九及李东宁和独立运动的元老派“韩国独立党”。<sup>③</sup> 也就在这新一轮的左、右派纷争中，中国对日本的全面抗战爆发了。面对日军的进攻，韩国临时政府也在李东宁和金九的争取下，获得中国国民政府当局协助，使临时政府百多名的韩人“大家族”，由南京、长沙、广州、柳州及四川的綦江到重庆。在这一迁移阶段，大韩民国临时议政府无从集会，所以临时政府人事上似乎没有变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已展开全面对日的浴血抗战，因而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之支持也由秘密而公开化。朝鲜革命党与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三党开始走向统一，乃结成了所谓“光复阵线”。后来正式定名为“韩国独立党”，为了容纳新加入“光复阵线”的各派领袖，临时议政府在1939年10月25日对国务会议之国务委员实行改选。同时将临时政府组织扩充成6部。当选之国务委员增为11人，他们分别是李东宁、李始荣、曹成焕、

① 金九：《白凡逸志》，第189页。

② 1928年11月25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60号。

③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64页。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金九、宋秉祚、洪震、柳东说、赵琬九、车利锡和李青天。国务会议主席仍由李东宁担任。这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3月13日李氏在綦江病逝为止，大部分时间国务委员会主席多由李东宁担任，所以我们权称其为“李东宁时代”。

### 五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金九时代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李东宁这位从1918年即参与韩国独立运动之元老，便由中国延边来到上海出任内务总长。经历了20多年的艰辛道路，在抵达四川綦江不久，便因病过世。国务会议主席开始由洪震、李始荣短期轮流担任，但其真正有实力的，乃是中国国民党最支持的金九。1940年10月8日，临时议政府基于现实情况，先行修改临时宪法，将国务委员会主席改由议政府直接选出，这样就提高了主席的职能。<sup>①</sup>后在同月15日议政府会议中，先行选出金九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接着再选李始荣、赵琬九、曹成焕、朴赞翊、赵素昂、车利锡6人为国务委员。<sup>②</sup>

由于金九在1932年虹口事件后，即与中国蒋介石委员长建立起特殊管道，所以在重庆金九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后，韩国临时政府便获得中国党、政、军的多重支持。在军事上，中国军事委员会帮助韩国临时政府建立起韩国光复军；在政治上，中国政府要求盟国支持韩国战后独立，并先行给予韩国临时政府在外交上以事实之承认；在党务上，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对韩国独立党（类似韩国临时执政党）诸人，更随时给予衣、食、住、行的照顾。所以除了在1941年10月发生弹劾议政府院长金明浚的政潮之外，<sup>③</sup>基本上韩国临时政府内部运作皆十分顺适。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韩国复国曙光在望，而中国蒋委员长也在1943年约见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金九、赵素昂、金奎植、李青天、金若山各派领袖，

① 1940年10月9日公布之《大韩民国临时约宪》全文，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集》（1），第23~27页。

② 1940年10月15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67号，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3），第145~146页。

③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集》（1），第240~243页，载《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72号。

面告诸人，中国力主韩国战后应为独立之国。稍后数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在英国伦敦记者招待会上声言，战后韩国当然应予独立。这使得在渝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士，因复国有望而为之精神大振。<sup>①</sup>

太平洋战起之后，韩国战后复国既然有望，中国当局力劝韩国临时政府诸人，应扩大基础，容纳异己。在此前提下，金若山所领导之朝鲜义勇军同意并入韩国光复军，而朝鲜民族革命党也愿放弃以往对韩国临时政府之“不关政策”，决定接受参加韩国临时政府之组织。为了配合此大团结之情况，韩国临时议政院在1942年10月25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十四届会议，在国务委员会中增加2位国务委员，分别是金奎植与张建相。此时临时政府之领导群开始成为主席金九、内务赵琬九、外务赵素昂、军务曹成焕、法务朴赞翊、财务李始荣、交通柳东说、宣传金奎植、学务张建相、生计黄学秀、秘书长车利锡。<sup>②</sup>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由于中国之提案，美、英两国原则上承诺战后给予韩国独立，为了提升战后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之国际地位，中国方面劝告韩人应再加扩大韩国临时政府之基础，以便获取各国承认之准备。在此压力下，韩国议政院又召开了第三十六届会议，再行修改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除加大临时政府主席之职权外，并正式增设副主席之职，协助主席处理政务。此外，又将国务委员地位提高，使政府行政各部处于国务会议下，各部部长亦得自非国务委员中选任。24日议政院正式依据新宪章改组政府，选举结果，由金九连任主席，金奎植当选为副主席，李始荣、曹成焕、黄学秀、赵琬九、车利锡、张建相、朴赞翊、赵素昂、金明浚、成周实、柳林、金星淑、金若山、安勋等当选为国务委员。而行政各部部长人选则为：

|           |           |
|-----------|-----------|
| 内务部部长：申翼熙 | 外务部部长：赵素昂 |
| 军务部部长：金若山 | 法务部部长：崔东旻 |
| 财务部部长：赵琬九 | 文化部部长：崔锡淳 |
| 宣传部部长：严恒燮 | 秘书长：车利锡   |

① 1943年8月4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78号。

②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124页。

此次临时政府包括了所有在重庆的韩国各党派代表人物，这一由韩国所有党派共同组成的政府阵容，一直维持到韩国临时政府返国前夕。<sup>①</sup>

### 六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生态变化

在日本亡韩以后，的确有一部分韩人认为韩国独立运动者都应到中国去。原因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与日本结下冤仇，必然会支持韩国的独立复国运动。但是也有一部分韩人，特别是信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韩人，认为美国才是应该设法依靠的对象。<sup>②</sup> 因为韩美之间在 1882 年曾签过一个《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中规定一方有难时，另一方应善尽协助之责任。何况 1918 年正逢欧战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刚发表了“民族自决”宣言，主张被压迫的民族有权自决。这些均在心理上给予韩人美国将会帮助其复国的极大的寄望。此外，就是位处韩半岛北方的邻国俄国，远在甲午之前，即十分关注朝鲜，所以在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政策上更积极开始支持朝鲜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斗争。<sup>③</sup> 因此，一部分韩国独立运动者，自然对列宁所领导之苏俄寄予极大之期望。因而我们注意到 1919 年 4 月在上海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其领袖群中实包罗了上述三类不同理念的人士。不过由于以上三派领导者当时之同心同德，一时间确使韩国临时政府这一组织呈现出对内朝气蓬勃、对外左右逢源的形势。所以金九曾形容那时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中国人，连蓝眼高鼻的英、美、法等洋人，都时常出入临时政府办公厅门户的盛况。<sup>④</sup>

但是，到了 1925 年前后，因为李承晚长期滞美不归，又和徐载弼等亲美派在美国另立韩国独立运动的组织，截留了美洲韩侨对临时政府的捐款，使上海临时政府在人力、财力上之支持度大为降低。而亲俄之共产派李东辉、韩亨权、李相龙、金俊渊等，也因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派间性格不合而离开上海，使得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与莫斯科间之关系也为之中断。加上早先从事独立运动的部分韩人在长期折磨下，心灰意冷开始返回韩国，一部分

①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 125～126 页。

② 金九：《白凡逸志》，第 30 页。

③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 1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 423 页。

④ 金九：《白凡逸志》，第 170 页。

人因生活困难不得不在沪自谋营生各奔前程，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几乎是门可罗雀，就像一个败落的大家庭，开始面对人财两空的局面。在此一情况下，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较能做的，便是依赖中国，加强争取来自中国各方面的支持。

幸亏此时中国革命势力已越过了长江、黄河，以继承孙中山遗志自居的蒋介石，也继承了孙中山扶植韩国等亚洲弱小民族的责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人与韩国人对日本人同仇敌忾的阵势业已形成。所以乃有蒋介石召见金九及金若山，开始给予活动经费，照顾韩国独立运动诸人之生活，并积极为其培训干部等秘密措施。唯此类援助，基于日本方面之一再抗议，总是或继或断，忽明忽暗并不牢固，反而常因经费分配问题，引起韩国独立阵营诸人间之纷争，甚而演出同室操戈的悲剧。<sup>①</sup>

随着韩国独立运动外在生态之变化，韩国临时政府领导层人事内部生态，自然也有变化。其特征之一，便是临时政府领导群之年轻化与单纯化。这是由于早年从事独立运动领袖之逐渐凋零，或亡故，或他去；另外便是李东宁、金九一派的原韩国国民党（重庆时代的韩国独立党）已因中国国民政府的强力支持而稳固地掌握了韩国临时政府，形成了以韩国独立党为临时政府执政党、以朝鲜民族革命党为在野党的既合作又斗争的生态局面。此一既单纯化又亲华化的生态，既影响到了在华末期韩国临时政府全民族代表性之不够，也影响到了国际社会对此“韩国临时政府”的认知性之降低。这与日后开罗会议宣言之解释变得荒腔走板，以及战后韩半岛被分裂均不无关联。

---

<sup>①</sup>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46～56页。